

张岱年全集

—增订版—

中国哲学大纲

上

張岱年著

哲學家須有求一致的客觀真理之誠心，即須充分的重
考量及其他哲學家的見解，或依他家的方法，或依
細細考量他家所得的結果的品值。藐視他家的
哲學家之資格。

任何哲學學說都非集妄，都必有所見。對於
論，不應完全摒弃之，而亦應察納其賢而成公
納之，更須提高之。對於任何哲學，都應且協
且批驳且擣除，且吸纳且揚揚。

任何哲學家的工作，都不至於是完全浪費，毫無所得
于其錯誤中的正確，實應辨識而吸收之。在哲學的戰鬥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哲学大纲/张岱年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7.5
(张岱年全集/增订版)
ISBN 978-7-101-120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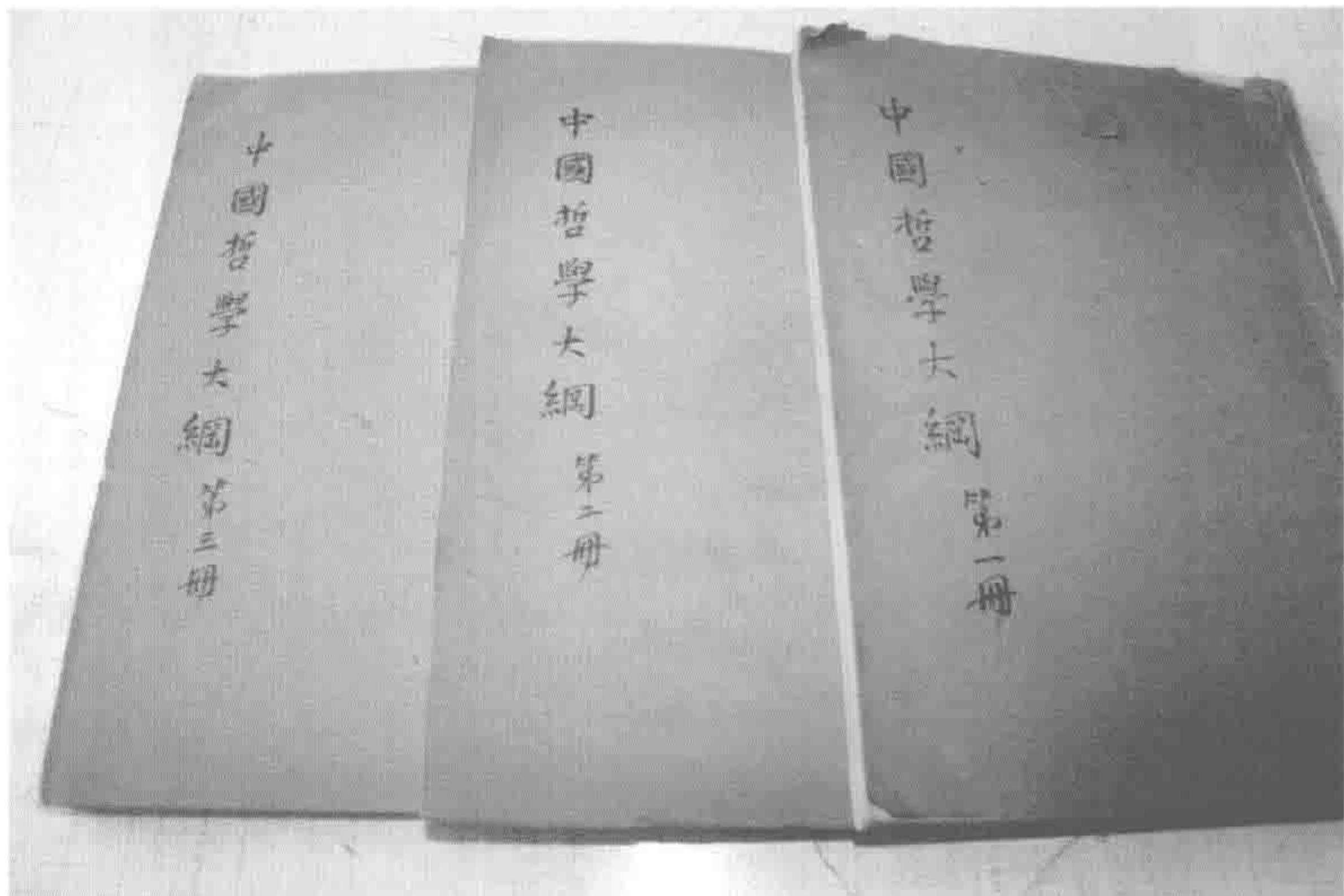
I. 中… II. 张… III. 哲学史-中国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95165 号

书 名 中国哲学大纲(全二册)
著 者 张岱年
丛 书 名 张岱年全集(增订版)
责任编辑 邹 旭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920×1250 毫米 1/32
印张 26½ 插页 3 字数 569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2040-0
定 价 99.00 元



张岱年先生摄于1936年



手订铅印本《中国哲学大纲》，书名由张岱年先生亲手题写

《张岱年全集》(增订版)出版说明

张岱年(1909—2004),字季同,别署宇同。原籍河北省献县(今属沧州市),生于北京。父张濂,为光绪朝进士、翰林院编修;兄张崧年(张申府),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193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同年人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30年代中期,撰写完成重要哲学著作《中国哲学大纲》。抗战期间滞留北平,1943年秋起任教于私立中国大学。1946年重返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78年起担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曾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华孔子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兼职研究员等职务。

张岱年先生曾对自己的哲学研究做以概括总结:“我的学术研究,可分为三个方面:一中国哲学史的阐释;二哲学问题的探索;三文化问题的探讨。”(《平生学术宗旨》)张先生注重阐释中国哲学史传统中的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及人本精神,并首倡关于中

2 中国哲学大纲

国哲学范畴与价值观的考察,其《中国哲学大纲》以哲学问题为纲,“审其基本倾向,析其辞命意谓,察其条理系统,辨其发展源流”,力图展示中国传统哲学之理论体系;在哲学问题的探索上,张先生将现代唯物论及逻辑分析方法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精粹结合,建立起自己“综合创新”的独特哲学体系,撰写于1942至1948年间的《天人五论》标志着这一体系的基本形成,并在日后不断深化发展;在文化问题上,张先生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的见解,既反对全盘西化,亦不赞同国粹主义,其所谓“综合”,既包括中西文化之综合,也包括中国固有文化中不同学派的综合,并以唯物辩证法为理论基础。张先生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卓越的典范性、奠基性、开创性贡献为学界所公认,为后人留下众多宝贵的思想资源。

张岱年先生著述宏富,出版的专著及论文集主要有《中国哲学大纲》、《天人五论》(收于《真与善的探索》)、《张载——十一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宋元明清哲学史提纲》、《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求真集》、《中国哲学发微》、《玄儒评林》、《文化与哲学》、《思想·文化·道德》、《文化论》、《晚思集》等。清华大学出版社曾于1989至1995年陆续出版《张岱年文集》六卷本,而后河北人民出版社又于1996年出版《张岱年全集》八卷本,惜因当时种种条件所限,《文集》、《全集》对张先生作品收录未周,尚有遗珠之憾。2014年,经张先生家属的授权与协助,我们开始对张岱年先生著作重新进行全面的收集

整理,计划用几年时间分批出版《张岱年全集》(增订版),以冀形成张先生全部著作的一个完整版本。

现将增订版《全集》编辑过程中我们所做的主要工作介绍如下:

1.增补。

增订版《全集》在《文集》、《全集》的基础上,通过家属提供和社会征集,将整理收录张先生大量未曾面世的手稿,包括学术论文(以1949年以前及晚年为主)、随笔札记、授课讲义、书信、日记、译著等,以及若干已发表而原版《全集》未收的作品。

2.新编。

增订版《全集》大体上分为专著、论文、杂著三大类。其中,论文部分以张先生自编之诸选集为纲,而将相应年代的零篇文章附于其中,如张先生有《求真集》,专收早年论著,则将1949年之前学术论文均附入此集中,而以“求真集新编”为书名。各类杂著亦依内容及体裁重新分类编排,其中札记手稿数量尤夥,且多以零篇残句形式保存,我们在家属协助下加以编选,与原《研思札记》等合并成集。

3.校勘。

增订版《全集》以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全集》为工作本,搜集众本详加比勘,并充分利用现存手稿及眷清稿对校,复核引文,斟酌审定,必要之处出校记说明。以呈现张先生著作原貌为基本原则,尊重作者用语习惯,除明显的排印错误及引文问题外,不妄加改动。引文出处标注格式亦在各书内部予以统一。

4.编制索引。

为便于读者查找,各卷均编制人名、书篇名索引。

《全集》中各著作版本情况及内容体例不一,整理时根据各书具体情况酌情处理,敬请参阅各卷前《编校说明》。

在增订版《全集》编辑过程中,张尊超、刘黄二位先生亲力亲为,整理张先生未刊遗稿,并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充分信任及大力支持;同时我们也有幸得到了陈来、杜运辉、李存山、刘笑敢、袁尔鉅等诸位先生的中肯建议,以及学术界、出版界众多朋友的支持帮助,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限于水平,书中或有疏漏失考及编排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6年7月

本卷编校说明

《中国哲学大纲》为张岱年先生之学术代表作，始撰于 1935 年，1937 年完成初稿，1943 年曾在北平私立中国大学印做讲义，1958 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署名字同。1982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时，张岱年先生做了大量修订，加入若干“补录”、“附注”，并删改部分文字，体现了张先生自该书出版后二十余年间哲学思想的深入发展，此后出版的诸本均以社科本为基础。该书后收入《张岱年文集》第二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 年），《张岱年全集》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年）。

本次出版，以《全集》本为工作本，以社科本对校，并参校商务本，订正历次排印中产生的文字标点讹误，尽可能还原张先生著作原貌，并对全书引文加以核对，统一引文出处标注体例。书后附有人名、书篇名索引，以便读者查找。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6 年 7 月

自序

近年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颇盛，且已有卓然的成绩。但以问题为纲，叙述中国哲学的书，似乎还没有。此书撰作之最初动机，即在弥补这项缺憾。此书内容，主要是将中国哲人所讨论的主要哲学问题选出，而分别叙述其源流发展，以显出中国哲学之整个的条理系统，亦可以看作一本中国哲学问题史。

作哲学史，当然也有其种种困难，然依人的时代顺序叙述，在纲领组织上，或尚无多少问题。而以问题为纲，叙述中国哲学之整个系统，则部门之分划，问题之厘别，在在须大费斟酌。更以事属草创，困难尤多。中国哲学本浑融一体，原无区分；而为求清楚明晰，实不得不加以区分，然又须于原来面目无所亏损。此书在问题之抉择与排比、部门之分判与命名上，前后凡更易十余次，仍不能尽惬意。在每一问题下，分述诸家学说，或更不免“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之病，惟自信尚无轻率苟且而已。

关于本书范围，于此当略加解释。本书所谓中国哲学，专指

中国系的一般哲学。中国的佛教哲学，虽是中国人的，而实属于印度系，故不在本书范围之内。而一切特殊哲学，如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等思想，皆不在本书范围之内。中国古书中，又有不少思想，与哲学有关，而实并非哲学，最显著者如汉儒之术数思想，可以说是宗教思想，本书亦皆不加论列。此外中国古书中的科学萌芽，虽极可珍贵，却不是哲学，本书也一概不述。如此区别哲学与非哲学，实在是以西洋哲学为表准，在现代知识情形下，这是不得不然的。

其次，关于本书的方法，亦当略加说明。我所最注重者有四点：

第一，审其基本倾向 中国哲学研究，应先辨识中国哲学之基本倾向，详言之即中国宇宙论之基本倾向，中国人生论之基本倾向等。如不先对于中国哲学之基本倾向有所认识，必不会深刻了解中国哲学家之学说。举例来说，如不知道中国哲学不作非实在的现象与在现象背后的实在之别，便不能了解中国哲学中的宇宙论。不知道中国大部分哲学家以天人合一为基本观点，则不会了解中国的人生论。基本倾向即是基本假定，有的是明言的，更有的是默认的。默认的尤须辨识，而亦最难辨识。

第二，析其辞命意谓 对于过去哲学中的根本概念之确切意谓，更须加以精密的解析。古人的名词，常一家一谊。其字同，其意谓则大不同。如道，老庄及程朱所谓道，是究竟理则之义；张子及戴东原所谓道，则是宇宙整个变易历程之义。又如性，孟子所谓性，仅指人之所以为人之特殊可能倾向；荀子所谓性，则指生而完具的行为，不论其与禽兽相异与否，惟不包含可能倾向；而宋儒

张程所谓性，乃指“极本穷原之性”，实即宇宙本根。又如气，一般人都认为是空虚神秘的字眼，其实乃是一个比较实际的观念，与物质的观念相接近。更如神字，最易误解；中国哲学中所谓神，非鬼神之神，而是能变之妙用之谊，如因中国哲人多讲所谓神，遂认为有神论，便大谬了。对于中国哲学之根本观念之意谓加以解析，这可以说是解析法（Analytic Method）在中国哲学上的应用。

第三，察其条理系统 冯芝生先生谓中国哲学虽无形式上的系统，而有实质上的系统，实为不刊之至论。此书的目的之一，是寻出整个中国哲学的条理系统。中国哲学之整个的系统，比每一个哲学家之系统，自然较为广大。每一个哲学家，对于所有的哲学问题，未必全都讨论到。而讲整个中国哲学的系统，则须对于所有哲学家所讨论的一切哲学问题，都予以适当的位置。求中国哲学系统，又最忌以西洋哲学的模式来套，而应当细心考察中国哲学之固有脉络。

第四，辨其发展源流 发展或历史的观点，是永远有用的；想深切了解一个学说，必须了解其发展历程，考察其原始与流变。而在发展历程之考察中，尤应注意对立者之互转，概念意谓之变迁与转移，分解与融合；问题之发生与发展，起伏及消长；学说之发展与演变，在发展中，相反学说之对转，即学说由演变而转入于其相反：这都是应注意审勘的。考察概念学说之发展与其对立互转，这可以说是辩证法（Dialectical Method）在中国哲学上之应用。

写哲学大纲，不宜多引过去哲学家著作之原文，即是写哲学史，其实也不宜引得太多。然而关于中国哲学，却有一种特殊情形，即是，在现在，中国哲学的研究，尚没有脱离考证的阶段。此

4 中国哲学大纲

所谓考证，是广义的，不只是指史实的考据，而兼指学说的考订。现在讲中国哲学，对于一个哲学家的学说有所诠释，实必须指出证据，实必须“拿证据来”。因此今日讲中国哲学，引哲学家的原文，实不只是引，而亦是证；不是引述，而更是引证。此书引原文处甚多，即由于此。

本书承冯芝生（友兰）先生和张素痴（荫麟）先生各审阅一遍，都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特此致谢。

公元一九三七年二月三日 张岱年

新序

——对于过去中国哲学研究的自我批判

这部书基本上是一九三七年写成的，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在这个期间，商务印书馆曾经两次决定付印，但都因为战事的关系没有成为事实。现在这本书是利用旧纸型付印的，只在纸型上作了一些字句上的修改。在这里，关于本书写作的情况，应该作一些简单的说明；对于其中所包含的缺点与错误，更应该作一些检查与批判。

本书写作的原意是想对于中国古典哲学作一种分析的研究，将中国哲学中所讨论的基本问题探寻出来，加以分类与综合，然后叙述关于每一个问题的思想学说的演变过程。在探寻问题的时候，固然也参照了西方哲学，但主要是试图发现中国哲学固有的问题，因而许多问题的提法与排列的次序，都与西方哲学不尽相同。在叙述中国哲学各方面的思想时，也曾经力求阐明中国历史上的主要的唯物主义思想与辩证观念。对于《易传》、王充、裴

顾、周敦颐、张载、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戴震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对于《老子》、《庄子》、《易传》、扬雄、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王夫之等的辩证观念，都曾经加以解说。虽然所讲的都不完备，但当时的主观愿望之一却是企图阐发中国固有的唯物主义传统与辩证思想传统。其次，对于中国从古以来关于人生理想的各种学说，也力求作一些比较充分的叙述。

二十年前，在写作本书的时候，由于我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没有深刻的认识，因而本书不可避免地有许多严重的缺点。这缺点可以说主要有四项。第一，本书虽然也叙述了唯物主义思想与唯心主义思想，也讲到两者互相排斥互相影响的情况，然而基本上却没有达到承认“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的科学水平。列宁早就说过：“现代哲学是有党派性的，正如两千年前的哲学一样是有党派性的。虽然用假冒博学的新名词或极其愚笨的非党派性掩盖起来，而在实质上，互相斗争的党派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结论》）我在二十年前却没有认识到列宁这个指示对于哲学史研究的深刻意义。直到解放以后，阅读了日丹诺夫《在西欧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才比较充分地认识了哲学史的科学定义。本书在讲述中国的宇宙论学说的时候，把所谓“理气论”与“唯心论”分开，而认为“唯物论”、“理气论”、“唯心论”是关于宇宙“本根”学说的三个基本类型，没有能够指出，所谓“理气论”乃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这样就模糊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根本对立，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第二，本书没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哲学思想的社会根源与实际意义，因而表现了严重的客观主

义的错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我当时所完全承认的。然而由于不同意一部分学者们的类似牵强比附的阶级分析，却竟忽视了对于历史上的哲学思想进行科学的阶级分析的严重任务。因而，在本书中，关于阶级分析的问题都避而不谈，仅仅孤立地叙述了哲学思想的内容，将哲学思想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割裂开来。这是本书的一个最严重的缺陷。第三，本书在叙述宇宙观思想的时候，由于强调了中西哲学的差异，竟忽视了在西洋哲学中比较突出的身心关系问题，其实在中国汉晋南北朝时代，“形神”问题也是很显著的，本书却只看重了客体与主体的关系的问题，而忽略了身心关系的问题。所以，王充关于形神的学说，范缜的《神灭论》，在本书中都没有得到适当的叙述。第四，由于我当时对于哲学的范围理解得相当狭窄，没有认识到历史观在哲学思想中的重要位置，因而对于过去的历史哲学一概没有叙述，这样就使本书的内容更有偏而不全的弊病。这四点就是这部书的最显著的缺陷，同时也就是我过去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工作的主要缺点。

除了这些缺点、错误之外，书中小的偏差就更多了。举例来说，讲中国哲学的特色的时候，认为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是“同真善”。这个提法是不科学的，只看到一些表面的迹象而没有深入问题的本质。又认为“既非依附科学亦不依附宗教”也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完全忽视了唯心主义与宗教的相互为缘以及唯物主义与科学知识的密切关联。在讲“义利”问题的时候，因为没有进行阶级分析，不能揭示所谓义利问题的本质，没有指出所谓“义”者实际上是指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言。在讲“命”的问